

“下来上去”:析张道一的艺术学与美学关系说

任华东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摘 要]与西方学界不同,中国学界对艺术学与美学关系的辨析不仅关乎学术研究,更关乎学科体制建构。作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建构的主要创建者与推动者之一,张道一自 1990 年代至今曾反复提出过一种“下来上去说”。这一学说不仅推动了学界对艺术学与美学关系问题的探讨,而且其中所蕴含的“重理论化”观念与倾向,对“一般艺术学”等学术型理论学科建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持。对“艺术学”之“学”的强调与探寻,可以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与艺术教育从传统的“直观—经验型”模式中走出来,步入到以对“经验”进行学术提升的“反思—先验型”现代研究范式中。

[关键词]“下来上去” 张道一 艺术学 美学 去理论化

一、问题的由来

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不是个新问题,因为“艺术学”学术领域的开辟与独立在西方是脱胎于“美学”的结果,脱胎的过程即是不断辨析两者的关系以确立艺术学研究的独特性、必要性与合法性的过程。无论是国外学者如马克斯·德索(Max Dessor)、埃米尔·乌提兹(Emil Utitz)、黑田鹏信,还是中国学者如宗白华、马采、李心峰、凌继尧等都曾经对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做过深入的比较与辨析。尽管不是新问题,但老话重提的必要性在于,虽然西方人首倡了“艺术学”^①的独立,但这个首倡主要发生在划分知识边界及探究学理的“学术研究”而非“学科体制”领域,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的艺术学界。然而,自 1990 年代中期尤其是 2011 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后,有关美学与艺术学关系问题的探讨就不仅与“学术研究”相关,而且也与“学科体制”的建构密切相连了。后者包含了学科点与学位授予、专业划分、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很多涉及现实层面的具体制度问题。因此,对艺术学与美学关系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当下就不仅仅是个“理论研究问题”,还是一个需要中国学人、教育者乃至全社会共同面对的“现实制度问题”。而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学科建构”层面,对二者关系的辨析与划界无疑是两个学界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之一。例如凌继尧认为“艺术学独立后,美学并没有像德苏瓦尔所期望的那样放弃艺术研究。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美学在对艺术作综合研究时,或者说美学在研究艺术一般时,它和艺术学的区别在哪里呢?德苏瓦尔当初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只是希望美学把研究艺术的职责悉数转交给艺术学。不过,在艺术学和美学同台竞技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艺术学就有可能被学科历史更为悠久的美学所吞噬、所替代”^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以来艺术中的审美理论话语研究”(2020ZDA031);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16ZDA17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华东(1978—),山东泰安人,博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美学、中外陶瓷艺术交流、电影美学。

^① 其实这里所说的“艺术学”准确地说应该叫作“普通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即德国学者马克斯·德索所说的“*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参见马克斯·德索《美学与一般艺术学》(《*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朱雯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 年,第 4 页。

^② 凌继尧:《美学、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艺术百家》2007 年第 5 期。

凌继尧的担忧不无道理!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办颁布了新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学位办便字20211202号)^①。该征求意见稿拟对艺术学学科与专业目录做部分调整,调整之一便是将原有的五个学术型一级学科压缩为一个学术型一级学科,相当于变相取消了原有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表现出很明显的“去理论化”倾向,在艺术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如果站在艺术学与美学如何处理两者关系这个角度思考这一学科调整的去理论化现象,我们会发现“艺术学理论”在艺术学中是最靠近美学的学科,它一方面在艺术学中承担着艺术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又与美学研究多有交叉乃至重叠,例如艺术美学研究,因而也起着沟通艺术学与美学学科的中介作用。但这一桥梁或中介性角色有时也显得颇为尴尬,人们经常会问: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学科边界究竟在哪里?或者说艺术学理论区别于美学研究的独特性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学界至今似乎尚未给出一个带有共识性的回答。这可能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被“变相取消”的诸多复杂原因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学科虽然进入艺术学学科体制已经二十余年,但仍面临着存在的“独立性”与“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凌继尧在十几年前提出的问题,即“美学在研究艺术一般时,它和艺术学的区别在哪里”,放在今天看依然是一个有效因而有必要继续深究的“真问题”,值得艺术学界与美学界高度重视。

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在教学与科研中发现,当代学者张道一教授提出的“下来上去说”,对廓清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以及辨明“一般艺术学”研究的独立性与合法性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尝试对这一学说做简要分析与阐发,希望能推动学界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二、张道一“下来上去说”的提出

作为中国艺术学学科的主要创建与推动者之一,张道一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探讨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问题时曾提出并反复阐述过一种“下来上去说”。

例如,他在写于1997年的《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一文中说,“一个民族能否像巨人般地站起来,没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思维是不行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思辨型的哲学美学需要研究,应用型的艺术美学也要研究”,美学需要“从书斋中走出,下到艺术中来”^②。三年后,在撰写于2000年的《我所认识的艺术美学》一文中他又谈到,“我曾经提出过请美学家‘下’来,即走出书斋,下到艺术中来。这样说的目的,绝不是否认哲学美学的研究,不赞成基础美学的研究,而是说让一部分美学家下到艺术中来(也不是让他们低就),因为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变化无穷,到处是美学研究的素材和原料”^③。2011年,艺术学学科终于从文学学科中独立出来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一年他在题为《在美学与艺术的交点上》的文章中再次呼吁,我“吁请研究哲学的美学家走出书斋,下到生活中来,下到艺术活动中来,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中国艺术的特点,作为研究的素材;把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当做参照,研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不能在他们的书中讨生活,同艺术家交朋友,了解他们如何创造艺术,如何体现美,然后带着这些素材,回到哲学中去。对于艺术家来说,要向哲学的美学家学习,分析哲学上抽象的美和艺术中具体的美,认识审美的实质;不妨跟着美学家上去,学一点哲学,了解哲学家怎样看事物、想问题,会有助于对艺术的思维。但艺术家又必须下来,只有在实际的生活才能迸发出艺术的火花”^④。一直到最近的2021年,张道一在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定位的访谈中还在提这个“下来上去说”^⑤。

综合张道一多年提出并反复阐释的这一观念,其字面意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所谓“下来”主要指美学界的学人要从抽象思辨的“哲学美学”层面“下到”具体的艺术现象中来,了解具体的艺

① 《重大调整!新版学科专业目录来了》(2021-12-24)[2022-11-30],<https://www.163.com/dy/article/GS0IN5AL0536A3D8.html>。该征求意见稿已于2022年9月13日正式颁布。

②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③ 张道一:《我所认识的艺术美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张道一:《在美学与艺术的交点上》,见《新世纪美学与艺术——江苏省美学学会第七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言,江苏省美学学会2011年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⑤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张道一先生访谈记》,《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术尤其是中国艺术的特点,并且同艺术家交朋友,了解他们如何创造艺术,如何体现美。第二,所谓“上去”,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学界的学人在“下来”获得了丰富的艺术素材后重新回到“上面”的美学中;另一个是,“下面”的艺术家也需要跑到上面的“美学”中,向哲学的美学家学习,但必须再下来。因为艺术家的创作“只有在实际的生活才能迸发出艺术的火花”。

显然,张道一的“下来上去说”只是一种“比喻性”说法,表层意思不难理解,他在倡导一种美学介入艺术研究时比较合理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上下相对”的表述方式并没有价值评判的意思,无所谓孰高孰低。尽管在“上去”方面,他提到了艺术家需要多了解美学方面的知识,但其侧重点主要还是在强调讲美学研究的“下来上去”问题。那么,张道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直接原因来自他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长期观察与思考。他认为当代美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个不足是从整体上看,美学界在研究艺术时对本民族的艺术不够重视,常“言必称希腊”,“甚至有人认为以谈西方为正宗”^①。另一个不足是,许多艺术美学研究常常充斥着“一些拗嘴的思辨式的语言,不切实际的举例,让从事艺术的人读起来如入五里雾中,捉摸不透,引不起读书的兴趣”^②。造成第二个不足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例如“西方美学是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它俯视艺术,作了更高层次的思辨,自然有其哲学上的道理。不过对于艺术来说,就明显隔着一层”^③;也有主观原因,即美学学者们没有“从上面下来”,真正下到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中。

我们认为,张道一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把脉还是很准确的。在2021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美学大会上,胡经之教授提出了“中华美学再出发”^④的命题。他专门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中忽然意识到,我们中华美学不能总是跟在西方人后面,而是要深入到悠久的中华美学与艺术传统中去,将中华美学与艺术的精髓挖掘出来。胡经之的看法与张道一的上述判断无论是提出的时间还是立意主旨都极为相似。这个判断的提出离不开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长期研判。有意思的是,学术界尤其是艺术学界对张道一在创建艺术学理论学科方面的贡献非常熟知,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与中国美学界的关系其实也“相当资深”。他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第四、五届副会长(1995—2005),江苏省美学学会第三、四、五届会长。1996年5月,他与中华美学学会前会长汝信共同推动,由中华美学学会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联合主办了《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丛刊。两个学界的联手深化了对美学与艺术学关系问题的探讨。

尽管张道一曾多次声明,“我不认为我是美学家,真正的美学,我研究得不深,尤其是西方美学。我是站在美学的门槛上观察”^⑤,但他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现状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却是相当准确与深刻的。在他看来,美学下到中国艺术研究中可以有效解决上述不足尤其是第二个不足,因为美学的“下来”并不是要“否认哲学美学、基础美学的研究,也并非让他们低就”^⑥,而是因为“艺术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充满了美学研究的丰富素材和原料。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他所说的美育实际上指的就是艺术。这样,美学家必然会大有用武之地,必然能大有作为;不但不会导致美学的倒退,反而能够为美学研究补血,提高美学的生命力”^⑦。

综上不难发现,张道一对美学有一种期待,即真正的美学研究在他看来除了要获得美学界的认可,也需要获得艺术界的认可,它应该既能启发艺术家的创作,也能深化艺术理论界对艺术美的本质等基础理论问题的认知。其实,除了表层意思,张道一有关美学研究的“下来上去说”也隐含着他对艺术学与美学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

① 张道一:《中国美学站起来》,《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③ 张道一:《我所认识的艺术美学》,《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④ 郭悦:《200多位大咖云集,全国美学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开幕》(2021-11-14)[2022-10-30],<https://new.qq.com/omn/20211114/20211114A0985300.html>。

⑤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张道一先生访谈记》,《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⑥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张道一先生访谈记》,《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⑦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张道一先生访谈记》,《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

三、“下来上去说”中所蕴含的艺术学与美学关系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术研究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深入研读张道一的“下来上去说”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这一学说思考的真正落脚点表面看是美学问题,深层却是艺术学研究与学科创建问题。也就是说,所谓美学研究的“下来上去”问题,其实隐含着张道一欲借助对“美学研究”的思考去解决“艺术学研究”诸问题的动机。

我们认为,“借助”的发生与其说是一种“行为”,不如说首先是一种“理解”,它包含了“为什么借”“向谁借”“借什么”“如何借”等逻辑环节,这个逻辑环节显示了研究者对“借者”与“被借者”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的洞察。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在张道一看来,美学与艺术学研究及其学科创建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借助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他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研究目的?综合张道一的学术思想,我们认为他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亲缘-互通性”关系:美学对艺术学研究及学科创建的助力。

在张道一看来,美学和艺术学具有“亲缘-互通性”关系,这种“亲缘性”表现在它们都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艺术现象上,研究对象上的高度重叠使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通相似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可以有效助推艺术学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创建之初,张道一认为“特别需要美学从艺术的实践中”将艺术学“托起”,使之“步步升高,健康地成长起来”^①。我们认为这是为什么张道一代表东南大学艺术学系选择与中华美学学会合作并联合主办《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丛刊的深层学理原因。

如前述,张道一把美学研究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偏“思辨型”的“哲学美学”,一类是偏“应用型”的“艺术美学”研究。“艺术美学”“从艺术中抽象出来的美,是艺术的‘精化’和‘晶化’,它有两个去处:一是由此再往上升,升到哲学中去;二是化为艺术的理论,又回到艺术里去,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产生指导的作用”^②。“升到哲学中去”的部分,也就是“哲学美学”的成果因其“哲学思辨性”常常让艺术家看不懂,但不一定是“写的不好”。尽管“哲学美学”作为基础研究也很重要,但相比较而言,张道一似乎更推崇艺术美学研究中那些“化为艺术理论”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偏应用”,会对艺术创作和欣赏产生指导作用。对于艺术学研究而言,“哲学美学”与“艺术美学”研究可以对接艺术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技法性的理论”“创作性的理论”“原理性的理论”^③。考虑到美学的“哲学属性”,美学对艺术学研究的“托起作用”其实主要发生在“创作性理论”尤其是“原理性理论”层面。

尽管张道一在美学功能问题上表现出一些“实用论”与“经验论”色彩,但总体上看,他对美学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视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美学”相对于“艺术学”而言所具有的“理论优势”。例如艺术美学对艺术美的本质、艺术审美经验、艺术审美教育等方面相对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探讨,可以有效拓宽与加深艺术学研究的理论宽度与深度。张道一认为“一个民族能否像巨人般地站起来,没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思维是不行的”^④。美学研究恰恰可以在理论深度与思维方法等方面给予艺术学以有力支持。

第二,“差异-互参性”关系:学术与学科领域的划界与互补。

如果说“亲缘-互通性关系”反映了两者之间具有“相通”乃至“相同”的一面,那么“差异-互参性”关系则强调了两者之“异”,正是这种“异”让艺术学研究及学科创建具有了“独特性”“学理性”及研究的“必要性”“合法性”。但是,这种“差异”与“学理性”不是自明的,且非一蹴而就能够完成,它需要学界在对两个学术领域的相互参照中,通过长期深入的比较与辨析才能明朗起来,才能让各自的特性彰显出来。考察艺术学研究的发展史可知,其学术研究与学科创建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与其

①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张道一:《我所认识的艺术美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③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④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他研究领域尤其是美学领域不断地展开“辨异”,从而确立“独特性”与“合法性”的过程。

鉴于此,我们认为,张道一对美学研究“下来上去”的反复强调与阐释,也隐含着一种“互参性策略”,即他试图通过对“美学”与“艺术学”差异性的比较与辨析,为两者进行划界并确立起艺术学研究及学科创建的“独特领域”与“合法性”。实际上,“上下相对”的语言表述方式颇意味。它不仅隐含着张道一对“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这两种人类文化活动差异性的认知,而且也隐含了他对“美学”与把艺术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艺术学”这两个学科在学术与学科属性差异上的理解。所谓“下来上去”这种将具有相反语义的词语并置在一起借以强调语义差别的表述方式本身,就隐含有“比较”、“辨析”以及“确立边界”的意味,具体涉及两个领域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比较与互参。

从学科属性与特征上说,张道一认为由于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它俯视艺术,作了更高层次的思辨”^①,因而会表现出鲜明的“形而上”哲学特色。与之相比,由于艺术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现象”,不管这个艺术现象是“门类艺术学学科”所面对的“特殊艺术现象”,还是“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面对的“一般艺术现象”,“艺术现象”相比较哲学要探究的“概念及命题”来说,从总体上会表现出更多的感性化与经验性特征,因而从总体学科属性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形而下”的学科基因与属性特征。

不过,两个学科在总体学科属性上的差别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一般来说,学术领域与学科边界的划分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对象的不同及由此所导致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区别是产生学术与学科属性差异的主要原因。从研究对象的区别看,虽然美学与艺术学研究都将目光聚焦在“艺术现象”上,但深入辨析会发现这种聚焦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即前者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后者却将其作为“唯一”研究对象。所谓“主要对象”是指,美学除了要研究“艺术审美”现象之外,还要研究“自然审美”与“社会审美”现象,但与后两者相比,由于“美”与“审美”的因素在“艺术审美”现象中表现的最为集中与丰富,因而最能将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审美规律”集中呈现出来,所以美学便将艺术审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看待,同时兼顾自然与社会审美研究。也就是说,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关注,其真正的研究目的只是想借助对艺术审美现象的探讨进而去研究“美与审美问题”,“艺术现象”只是它的“跳板”而已。张道一认为,“一般地说,美学是从审美的角度研究人之对于美的创造和艺术如何表现了美”^②。他赞同蒋孔阳先生的看法,认为美学其实是借助对“艺术现象”的探讨,最终“研究美以及于美有关的各种问题”^③,例如美本质问题、审美形态与范畴问题、审美心理机制问题、审美功能与价值问题等。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构成美学系统的诸美学范畴与命题,是美学从对“艺术审美活动”的研究中抽象与抽取出来的结果,具有高度的思辨性、普遍性与先验性特征,因而这些美学范畴与命题,就不单单适用于艺术审美现象,也应该同样适用于自然与社会审美现象,由此使美学的研究带有了鲜明的哲学特色。

与美学不同,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现象本身”,这个“本身”涵盖了与艺术现象相关的各个组成环节,例如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分类与类型、艺术传播、艺术消费、艺术教育等,研究目的是探求各种艺术现象背后具有共通性与普遍性的艺术本质与法则,以寻求对艺术的深刻阐释与理解,而非以艺术为跳板去探讨纯粹的“审美”问题。当然,艺术学研究中也会涉及审美问题,但这个问题只是与艺术现象及艺术学研究相关的一个方面而已,不是全部,并且常常与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艺术教育等问题相互关联在一起。这一思路突出体现在张道一对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的设想中,即“十条经线说”,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教育”“民间艺术学”“艺术文献学”。张道一认为艺术学研究的这十个“基本分支”“就构成了它的10条经线,因为这10条经线就把音乐、美术、舞蹈、戏剧都织起来了,这

① 张道一:《我所认识的艺术美学》,《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张道一:《我所认识的艺术美学》,《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③ 张道一:《艺术学的研究与方法》,《美术观察》2009年第4期。

块布的幅面是很宽的”^①。在这一设想中,“艺术美学”只是艺术学基本分支学科中的一支。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虽然两个领域都将研究视野聚焦在“艺术现象”上,但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求隐藏在艺术现象中的“美”与“审美规律”,艺术现象只是美学研究为完成这一研究目的所借用的典型样本。与之不同,艺术学研究的目的则是要探求“艺术活动规律”,既包括艺术审美规律也包括艺术创作规律、艺术分类规律、艺术传播规律、艺术教育规律等领域,涵盖了围绕艺术活动或艺术现象所发生与展开的全部内容。因而从侧重点上说,“艺术现象本身”其实并不是美学研究的重点,但却是艺术学研究的归宿。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张道一对“艺术美学”学科归属问题的认识是有矛盾之处的。例如他一方面认为“艺术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或说是一个部门美学”^②,将其放在了“美学”中,而美学属于哲学学科,另一方面他又将“艺术美学”看作艺术学研究的十条基本分支之一,将其放在了“艺术学学科”中。我们认为,这个矛盾的产生既与张道一的学术主张有关,也与“艺术美学”自身的内在学理逻辑相关。就前者而言,张道一对美学尤其是对其“功能性”的认识的确是有矛盾之处。他既认可美学研究的“先验性”,承认它是对审美活动所做的普遍或一般性研究,又不排斥它的“经验性”与“实用性”,认为美学可以指导实际的创作与欣赏。这个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他在对待“艺术美学”的学科归属时容易陷入自相矛盾境地,例如:当他要强调美学的“先验性”时,便将其放在“哲学学科”中;而当他欲强调美学的“经验性”与“实用性”时,又将其置放到了“艺术学学科”中。除此之外,这个矛盾的产生也与“艺术美学”自身的内在学理逻辑相关,即“艺术美学”既与美学相关,又与艺术学相连,处在美学与艺术学之间,位于两个学科的交叉重叠地带。这个特点使其在学科归属问题上常常飘忽不定。这种飘忽不定不仅发生在张道一身上,也发生在众多学者身上。例如凌继尧一方面认为“艺术美学”与“艺术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但又从研究方法上将二者区别开来,把前者放在了“哲学学科”中,认为“艺术美学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艺术,其研究带有哲学意味,具有自觉的美学性质”,而艺术学则“在某一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涉及美学范围,具有不自觉的美学性质”^③。再如马采把“艺术哲学(即艺术美学)”分为了“旧式艺术哲学”^④与“新式艺术哲学”,把前者放在了“哲学”中,将后者放在了“艺术学”中。

限于主题与篇幅原因,关于“艺术美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我们不拟在此处展开。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张道一的阐释有不够严谨之处,但他对美学与艺术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差异的认知,我们基本是持赞成态度的。这些差异还进一步体现在张道一对二者研究方法的认知中。

在研究方法上有学者认为,“从艺术的真凭实感中产生对艺术的科学认识,是艺术学研究方法”,它“对艺术的研究比较具体实证”^⑤。而“从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原则来研究艺术是典型的美学方法,它特别明显地体现在黑格尔的《美学》中”,“美学对艺术的研究比较抽象思辨”^⑥。考察中西学界可知,主流美学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方法,即从概念辨析与命题假设开始,借助逻辑学方法展开层层推演。美学研究最终要超越艺术审美经验层面,进入哲学先验层面,围绕概念与命题展开探究。所以严格地说,美学其实是一门主要与概念及命题推演打交道的学科。美学史上如鲍姆加登、康德、黑格尔等主流美学研究主要采用这种方法。而艺术学则更倾向于“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即从具体或一般的艺术现象出发,通过观察、实验、归纳、比较等方法凝练出抽象的概念与命题。张道一将这两种路径概括为“朱光潜之路”与“宗白华之路”^⑦。他认为,前者更适合美学,而后者更适

① 张道一:《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张道一:《我所认识的艺术美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③ 凌继尧:《艺术美学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④ 马采:《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艺术学散论之一》,参见王廷信主编《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⑤ 凌继尧:《美学,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艺术百家》2007年第5期。

⑥ 凌继尧:《美学,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艺术百家》2007年第5期。

⑦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张道一先生访谈记》,《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

合艺术学研究。作为艺术学学者,张道一自然更倾向于后者的研究路径。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之路时说“我的学术道路,可以说主要是遵循着从艺术经验到艺术理论及其体系建构,再从学科理论到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这样一种研究思路,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然后又由上而下的治学过程”^①。

不难发现,张道一的治学过程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与清醒的学科差别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等方面所具有的“亲缘-互通性”尤其是“差异-互参性”关系的深刻认知。我们认为,这些认知是推动他不遗余力的创建“艺术学”学科并在创建过程中积极与美学研究展开对话的深层学理依据。而这个学理依据就构成了艺术为何要“学化”,且即便有了美学也还是必须要深入展开艺术理论尤其是“一般艺术学”研究,乃至将其学科化的根本原因。艺术研究与学科创建的“合法性”即来源于此。

四、艺术学内部的“上去下来”与“反思-先验型”现代学科范式的建构

其实,回顾张道一的治学历程与相关学术活动,如果说他在美学学会组织中的任职仅仅是“客串”而已,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学与学科创建才是他真正的用功所在。

作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四届成员与召集人,张道一1994年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综合性”教学与研究为特色的艺术学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创建这个系的目的在于对“艺术整体”进行“综合性”的理论思考与探讨,取名“艺术学系”而非“艺术系”的目的即源于此。1997年,同样是在他的主要推动下,与一级学科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首次进入到学科体制建构中。这个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其实就是当年德国学者马克斯·德索要创建的“一般艺术学”(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但与马克斯·德索只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为“艺术学”与“美学”做了划界不同,以张道一、于润洋、李心峰、凌继尧、仲呈祥等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学界同仁通过不懈努力,进一步将之推进到“学科”划界与制度建构层面。2011年,这个名为“艺术学”的二级学科更名为“艺术学理论”,并成功晋升为“一级学科”。

通过梳理张道一的“下来上去说”我们发现,多年来他其实有一个“良苦用心”,即不遗余力的呼吁艺术学界与教育界必须重视“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良苦用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中国现有的学科设置中,美学学科、文艺学学科尤其是前者是最靠近艺术学的学科门类。张道一之所以不停地强调艺术学建设要与美学展开对话与合作,不仅仅因为艺术学最初是从后者中分化出来的,而且因为美学研究的哲学属性使美学学科具有原理性、奠基性、先验概括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美学研究在“下来上去”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助推艺术学研究,深化其基础理论维度。第二,即便在艺术学内部,张道一也在呼吁一种类似的“上去下来”策略。前述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路径时认为,他走了一个“自下而上,然后又由上而下的治学过程”,具体而言即“以民间艺术为学习和研究基点,逐渐扩展到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研究和民艺学、美术学研究,而后攀登到艺术学的高峰对艺术整体进行综合性理论思考与探讨,最后再运用艺术学理论来重新审视各门类艺术的个性与共性”。他说,“这是我治学的基本路径,也是进行艺术学学理建构和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脉络”^②。在艺术学研究内部的“上去下来”策略中,承担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理论(即一般艺术学)研究”颇为重要,因为它是对“艺术整体”进行“综合性”理论思考与探讨的学科。张道一在创建东南大学艺术学科时力主使用“艺术学系”而非“艺术系”之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天壤之别。这个“学”意味着,它是一种“理论反思”,而非单纯的“经验描述”,而且反思的对象不是特殊的具体艺术作品或特殊的门类艺术,而是把所有艺术现象视为一个“整体”,是对“艺术整体”的理论反思。这一特点使“一般艺术学”既区别于“美学”对人与世界之审美关系问题的研究,也使其有别于“门类艺术学”对“具体艺术门类”的理论探讨,但同时又吸取了美学的“理论反思性”特点和门类艺术学的“感性经验性”特征,因而是一种“先验性”与“经验性”的融合。这在张道一有关艺术理论研究的“十条

① 张道一:《艺苑路漫 上下求索——我的艺术学问学之路》,《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

② 张道一:《艺苑路漫 上下求索——我的艺术学问学之路》,《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

经线”构想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一般艺术学”既承担着探讨基础理论与人才的培养工作,又在沟通“美学”与“门类艺术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该学科于1997年进入学科体制后一直是该体制中最具“基础理论性”的学科,因而在艺术学学科框架中长期处于首要位置。

五、结语

综合上述两个“用心”我们不难发现,张道一的治学心路与学科建设实践其实纵贯了三大学术领域:“美学”“艺术学理论(即一般艺术学)”“门类艺术学”。他既有对美学学科的长期深入观察,并积极推动艺术学与之展开深入对话与合作,又身体力行地在“门类艺术学”与“一般艺术学”研究之间穿梭。尽管这种“上下穿梭”让张道一在做理论阐发时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实用观”与“工具观”倾向,但这种自觉跳出自己所熟悉的“门类艺术学”领域,以一种“上下穿梭”的治学理念与路径,吁请艺术学界要重视“对艺术整体进行综合性理论思考与探讨”。现在来看,无论是其学术视野还是学术心胸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既是他的治学策略,也是他在东南大学及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领域与学界同仁一起展开学科建构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体现了强烈的“重理论化”或“重学化”倾向。正如他所主张的,“一个民族能否像巨人般地站起来,没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思维是不行的”^①。

我们认为,对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大力呼吁与“一般艺术学”学科的创建,是近三十年来以张道一、于润洋等为代表的学界同仁对中国艺术学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之一。对于这一倾向尽管不乏质疑之声,但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三十余年时间里,这一倾向也同时得到了艺术教育界与学界同仁的广泛支持,因为“重技巧轻观念”“重经验轻理论”“重实用性理论轻基础性研究”,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缺乏理论高度与深度,的确是中国艺术创作、教育与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以张道一为代表的学界同仁之所以排除万难、不遗余力的将“一般艺术学”学科纳入到艺术学学科体制中并将其放置在“首要位置”,就是因为它的理论特质可以有效增强与提高中国艺术学学科的理论性与学术性,使其具有更加牢固的“科学属性”,从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与艺术教育从传统的“直观-经验型”模式中走出来,步入到以对“经验”进行学术提升的“反思-先验型”现代研究范式中,可谓意义深远!尽管这一过程“道阻且长”,可能会出现反复波折甚至倒退现象,但“天行有常”,这一现代研究范式的大势与实现终不可阻挡。

(责任编辑 卢 虎)

^①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